

苏轼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，从《苏轼文集》里的策论、书、表、状、札子中足以体现其政治上的远见卓识、民本思想、治国理念和为官业绩。近日，首届“才高八斗”衡阳市全民国学知识电视争霸赛年度冠军罗衡卫做客国学讲座，讲述苏轼的治国理政智慧——

为国不可以生事，亦不可以畏事

■本报记者 许 珂



黄沐 摄

苏轼以京官身份从签书凤翔判官起步，从地方到朝堂，再由朝堂回地方，做过八州知州、一任皇帝大秘书（知制造）、一任帝师（侍读）、吏兵礼三部尚书，四次贬官，从政四十年。

古人称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为三不朽。曾国藩说过：立言如马、班、韩、欧、李、杜、苏、黄，古今曾有几？这里的“苏”，指的就是苏轼。

A 一个政治家最重要的素质是有远见的卓识

24岁的苏轼参加制科考试，他有感于大宋太平盛世表象下隐藏的不安定因素，写了《晁错论》，文章开起笔不凡，写下金句：“天下之患，最不可为者，名为治平无事，而其实有不测之忧。”句中的“不测之忧”，说的是汉景帝时的国泰民安中隐含着诸侯之患，其实也对大宋的现实有所指。

苏轼生活的时代，外有少数民族的西夏的侵扰和契丹的威胁，内有人多坏事的低效率“冗官”体系、120万之众的兵将不相习的“冗兵”结构和滥赏导致财政入不敷出、百姓不堪重负。苏轼在举朝上下高歌升平的时候，却发现大宋深藏的隐忧、大宋表面上社会安定而实际上却存在严重的

内忧外患，这就是他的政治素质。

面对“不测之忧”应该怎么办？苏轼认为，如果不作为，消极地看着事态发生却不去想方设法对付，那么就会发生无可挽回的祸乱。如果乱作为，操之过急，那么支持的人不会多。苏轼的《晁错论》借评论晁错，希望后来者能汲取晁错的教训，既要有忧患意识，能发现问题，还要深谋远虑，不轻举妄动，更要有坚强的意志和临危不惧的精神，能做到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，舍身报国，方能成就伟业。

宋仁宗看了苏轼的文章，认为自己为子孙得到了宰相之才。可惜，仁宗皇帝还没来得及重用苏轼就驾崩了。

治平二年（1065年），宋朝岁入虽达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贯，官费、军费等支出却达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贯，入不敷出，财政困难。同时，韩琦等国之重臣，不着力解决内忧外患问题，也不为国选贤，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一件事上，那就是满足英宗叫生父为皇考的愿望，提请文武百官讨论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。当时，满朝大臣不研究对付外族侵扰的对策，不研究解决“冗官”“冗兵”和“冗费”的国策，却耗在这件事上，确实是大宋的悲哀。而这一切，苏轼预见到了，可见苏轼作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。

民脂民膏的官员，重复征税，弄得天下百姓都怨恨，推算这些赋税的来历，一定会把过失全算在您的头上。

5.防止官员用青苗法强迫百姓贷款。苏轼认为，借贷这种事，还是让商人来做吧。如果皇帝您要推行青苗法，到时候，天下的人恨您，史书记载您的这事，说青苗法是由您开始推行的，难道不可惜了您的一世英明伟大吗？

6.提拔人才不能随意。“今若多开骤进之门，使有意外之得，公卿侍从，跬步可图其得者，则不肯以侥幸自名，则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沦于叹，使天下常调举，生妄心，耻不若人，何所不至，欲望风俗之厚，岂可得哉？”最近，朝廷提拔的人，老实干事的少，花言巧语、投机取巧的多，希望皇帝能纠正这种做法。

7.要完善的监察机制。苏轼认为，国家有必要完善监察机制，防止朝中重臣独揽大权，危及皇权，也要防止地方要员挑战皇帝权威。建国以来没有处分一个监督检查官员，这并不是他们都是好的，而为了让他们敢于大胆监察，监督权力运行没有后顾之忧。

阿里骨知道自己的爵位封号是骗来的，特别担心鬼章讨伐他，故欲借力于西夏以自重，于是阿里骨和西夏这个冤家对头勾结在一起（始有解仇结好之谋）。而鬼章对他们无可奈何，就把气撒在大宋头上，发泄朝廷让乱臣贼子当他的君主的愤怒，所以才侵犯大宋边境。

现在西夏看到大宋抓住了鬼章，软硬兼施，向朝廷提出过分的要求。若朝廷又想花钱买平安，那西夏又会掌握主动权。他们觉得战也好和也好，一切以从大宋捞到好处为目的，反正成本低，风险小，不捞白不捞。

分析各种弊端后，苏轼希望皇帝秘密下令，让边关将士做好战斗准备，严阵以待。想勒索，没门！诚意来谈，大门敞开；想要开打，奉陪到底。不用几年，他们就会受不了，现在我们费点事，以后就安定了。

《老子说了什么之》——

老子只是讲了真话

■李德元

老子曰：“不尚贤，使民不争”。

春秋战国时代，在氏族国家体制崩溃之后，以什么样的政治思想来构建国家的政治体制，是当时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。各路社会精英提出了不同的政治主张。儒家和墨家主张举贤用能。儒家认为：“一人有庆，兆民赖之，其宁惟永”（《尚书·吕刑》），墨家认为：“夫尚贤，政之本也”（《尚贤上》）。也就是说，国家政治的根本在于尚贤举能。只要选择了“厚乎德行，辩乎言谈，博乎道术者”（《尚贤上》），协助国君治理国家，管理社会，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就有了保证，社稷也就能祥和安泰。对于儒家、墨家的主张，法家坚决反对。其理由林林总总，列二三以示其意。一曰，治国不需要所谓的贤者。只要“万事皆归于一，百度皆准于法。归一者，简之至；准法者，易之极。如此则顽鄙聾瞽，可与察慧聪明同其治也”（《尹文子》），意思就是，只要国家有完备的法律，且严格依法办事，治理国家就相当容易了。就是那些顽劣、愚蠢、耳聋、眼瞎的人，也可以像贤明、智慧、耳聪、目明的人一样，治理国家；二曰，若依靠贤人治国，国家没有固定的法度，其治理则没有持续性。“若使遭贤则治，遭愚则乱，是治乱属于贤愚，不系于礼乐”（《尹文子》）；“且夫尧舜桀纣，千世而一出……中者上不及尧舜，而下者亦不为桀纣。抱法则治，背法则乱。背法而待尧舜至乃治，是千世乱而一治也。抱法而待桀纣，桀纣至乃乱，是千世治而一乱也”（《韩非子·难势》）；三曰，人在其位，能不能有所作为，不在于其贤德，而在于其权势地位。故“尧为匹夫，不能治三人。而桀为天子，能乱天下。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，而贤智之不足慕也”（《韩非子·难势》）。

老子说：“不尚贤，使民不争。”可见老子也不赞成尚贤。但老子反对的似乎不是贤者本身，而只是不接受因尚贤而引起的民争。

老子凭什么说尚贤必引起民争呢？这须从尚贤的主张中去找答案。墨子的尚贤有两层意思。一是为君选臣。“求圣君哲人，以神辅而身。”“求求元圣，与之戮力同心，以治天下。”（《墨子·尚贤中》）；二是为国选君。“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，立以为天子。天子立，以其力为未足，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，置立之以三公。”（《尚同上》）

老子所说：“不尚贤，使民不争。”是针对为君选臣说的，还是针对为国选君说的呢？只有先搞清楚了这一点，才能知道老子的思想动机，才能理解老子的意思。若老子“不尚贤”，所反对的是为君选臣，那就是门户之见；若反对是为国选君，那老子只是讲了真话。

为君选臣也会引起竞争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按墨子的意思，选贤不问出身，“虽在农与工肆之人，有能则举之”，这意味着打开了一条社会上升通道，必然引起人蜂拥而至，故争也；被选上之后，则“高予之爵，重予之禄，任之以事，断予之令。”然名、利、权乃人之所欲，其求者多，用者少，故争也；被选上之后，贫不用终身制，“不肖之徒抑而废之，贪而贼之，以为徒役。”如果选上之后，做的不好，没有业绩，不但高爵、高薪、高位没有了，还要发配去做苦役，一落千丈。为了保住其既得利益，就得争宠于朝，结党于朋，故争也。但这种争，只是体制内的名利之争，并不是遍及朝野的民众之

争。老子所说的“使民不争”，应该指的是遍及朝野的民众之争，而不是体制内的名利之争。故老子“不尚贤”，所反对的应该不是为君选臣，而是为国选君。

举国选君必会引发民众之争，这是历史和现实都已充分证明、不言而喻的事实。

在远古，当猿类社会进入人类社会之后，其首领的产生方式也发生了变化。猿类社会遵循动物法则，强者为王，首领是靠暴力打出来的。人类社会远比猿类社会复杂，力量不再是强者的唯一标准，首领的产生不能靠简单的打斗来决定，而需要社会成员的认同。这种认同，以古代语言之就是尚贤，以现代语言之就是民主。当然，对于远古原始的民主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运作，我们不得而知。在原始社会之初，民智尚未开发，其时成员对首领的认同可能十分简单，只要他稍有一技之能，能够让部落成员活得好一点，就能得到部落成员的认同。这种一技之能或许是他发明了一种新的采摘方法，或许是他开辟了一条新的迁徙路线，或许是在某一次迁徙中所表现出来的组织能力等等。随着生产力的提高，文明的积累，民智的开发，简单的与众不同已不足以令人信服，需要综合考量智慧、勇气、意志、爱心、沟通能力、凝聚力等等诸多因素，领导人的选拔也就越来越复杂。但这些选项中多是主观印象，一人能不能成为首领全在部落成员的好感。于是，现代民主中的一些毛病，那个时候似乎都有了。《诗经·书》有云：“媚于庶人”“垂事养民，拊循之，吮呕之，冬日则为之饘粥，夏日则与之瓜瓢，以偷取少顷之誉焉”（《荀子·国富篇》）。可见，古人为了争取民意，其笼络人心的作法，与现代某欧洲国家总理候选人，承诺当选后全国水电费免费是一样的。由于“垂事养民”，使民主背离了部落的根本利益，由于“媚于庶人”，使被举之人关系胜于德才。结果选出来或许不是杰出的领袖，而是投机钻营的宵小之徒。而这些宵小之徒又不足以领导部落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，必有强人出来与之对抗。其抗争的具体情形，是不是也像现代国家一样，民众分裂成很多派，相互攻讦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但有一点是确定的，就是原始民主引起了民争，其制度本身又不能解决，进而危及了原始人类的生存。于是，人类社会权利的分配方式又回到了动物世界，强者为王。所不同的是，动物世界的强者是个体，而人类社会的强者是一群人组织起来的国家机器。

往事越千年，民主已被公认为当今人类社会的历史潮流。自人类社会重新选择即民主制度以来，人类社会的文明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但回望人类社会实行民主的这二百多年的历史，似乎现代民主，也不过是原始丛林民主的旧瓶装新酒而已。虽然，现代民主在限制权力作恶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，也在少数一些国家比如北欧国家的治理中取得了很大成功。但在全球范围内，似乎尚未从根本上给人类社会带来新的希望。在这种社会游戏中，人们所看到的似乎是没完没了的为反对而反对；是政客之间为选票，置基本民生而不顾的相互攻讦；是为了争取选票而“垂事养民”，把国家根本利益当作儿戏的政治许诺。现代民主能不能引导人类走向至善，还有待历史的证明。但有一点是确定的，全民选君式的民主，必然引起民争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。那么，现代民主是否重蹈原始丛林中的覆辙，而使人类权利的分配再一次回到动物世界，也只能等待历史的证明。

而现在可以证明的是，老子所讲的“不尚贤，使民不争”是历史性的真话。



·品庄悟道·

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，而大山为小；莫寿乎殇子，而彭祖为天。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。（《齐物论》）

泰山是一粒尘埃

■文/谭浩泉 图/陈诗华

庄子为了说明深刻的道理，常常讲话讲得你目瞪口呆，所谓语不惊人誓不休。他故意说天下之大没有比秋毫末端更大的东西，泰山却是小的；夭折的婴儿长寿，八百岁的彭祖却短命。常人理解，这不是故意说反话吗？

知识追求中，庄子一开始就把目标对准人间最终真理，对准自然万物、天地人的根本意义，和一般生活现实中只关注趋利避害的思考高了不知多少层次。他努力解除人心的狭隘，目光短浅的限制，独立支撑起浩大的生命精神，和广阔无限的天地时空对话。秋天鸟兽初生毫毛之尖端，相对“没有”，已是大天下了；泰山相对宇宙不是一粒灰尘吗？凡儿比之从未有的生命当然就是长寿了，彭祖与开天辟地以来的造化相比，800年也只能算短命！心灵无限，语言有穷，有限语言背后，永远有一个广大无垠的世界，如此以来，我们还要定个绝对标准和答案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？

因为人对物我分别对待，才会无休无止地追求外物。如果一个人将自己和宇宙万物“并生、为一”融为一体，就可以超越时空的界限，摆脱对外物的依赖，体验天地的壮阔无垠、浩大无比！

C 一个政治家最基本的为国智慧是“不生事不畏事”

“夫为国不可以生事，亦不可以畏事。”这是苏轼给宋哲宗的奏议《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》中的原话。

元祐二年八月，北宋俘获了西蕃首领鬼章并押解进京。时任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造兼侍读的苏轼认为，对待民族事务、外交和国防事务，这样做太轻率，很不妥，这样的边防政策是非常危险的。

苏轼认为，对西夏用兵表面上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、劳民伤财，实际上严厉打击了西夏统治者的嚣张气焰。“岁赐既罢，和市亦绝，虏中匹帛至五十余千，其余老弱转徙，牛羊堕坏，所失盖不可胜数。饥羸之余，乃始款塞。”苏轼认为，我们过去犯了怕事的错误，执政大臣知道大宋百姓不喜欢打仗，也没有深谋远虑就答应了他们的和谈要求，还花

钱买和平，每次他们的使者一来，就给使者五万余匹绢，他们回去卖一匹能卖五六千铜钱，让他们得了好处还得意。这样一来，反而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，更加轻视大宋。

苏轼指出，当初若不生事亦不畏事，强硬回击他们，他们翻脸也不会这么快。为什么会发生西蕃鬼章这件事呢？阿里骨是重毡的臣子，却挟持契丹公主，并害死他的主君董毡及其妻子，还对外隐瞒董毡的死讯，匿丧不发。过了一年，等局势稳定了，才假称是董毡的养子，并伪造鬼章、温溪心等人的签名上书大宋朝廷，请求让阿里骨继承董毡的封号。而当时的执政大臣草率行事，没有仔细盘查事实真相，只图省事，贸然答应了阿里骨的请求，授予他符节与斧钺，认可他继位。